

联邦调查局密档中的钱学森旅美生活

2009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逝世不久,美国联邦调查局解密了一套关于钱学森案件的档案。这套档案共计400页,时间跨度从1949年5月至1967年7月。虽然这套档案形成的初衷是想调查钱学森是否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但也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钱学森的旅美生活和人格魅力。

暗中保护钱学森的神秘女士

钱学森旅美期间的社交圈子大都是男性。但是,他当时也结交女性朋友。1942年11月2日,钱学森在填写一份外国人安全调查问卷时,根据要求列出了他最亲密的5位朋友,依次是卢嘉锡(加州理工学院客座研究员)、冯·卡门(钱学森的导师)、弗兰克·马林纳(钱学森的师兄兼好友)、安德鲁·马杰夫人、威廉·西尔斯(钱学森的师兄兼好友)。除了安德鲁·马杰夫人外,还有一位神秘的美国女士在钱学森的旅美岁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36年10月,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转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不久,一位美国姑娘注意到了这个才华横溢的中国留学生,她最初只是仰慕钱学森,后来变成非常喜欢他。

冷战爆发后,美国情报部门根据截获并破译的苏联电文,坚信有很多美国共产党党员在为苏联服务。从1947年3月起,美国情报部门就开始秘密调查钱学森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最初他们只发现钱学森订阅过美国共产党办的《人民世界日

报》,并未发现更多能证明他认同共产主义思想的证据。1949年夏,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据新的线索,开始调查钱学森与美共党员威因鲍姆夫妇的关系。如果联邦调查局根据调查结果,认定钱学森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他不仅会被禁止参与涉密研究,还很有可能被驱逐出境。面对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询问,这位女士主动为钱学森辩护。

档案中这位被称为“线人T-7”的女士认为,钱学森虽然知道威因鲍姆夫妇亲共产主义,但是他从未同样认同这些信仰。这位女士还向联邦调查局特工提供了以下信息,以便进一步证明钱学森并不认同共产主义的原则。如钱学森有一次向她表示,他实际上非常同情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雅各布·杜布诺夫的妻子贝尔·杜布诺夫(杜布诺夫夫妇都是美共党员。当时苏联在洛杉矶设有领事馆,贝尔·杜布诺夫经常与苏联官员联系)。她从钱学森的言论中推断,他同情贝尔·杜布诺夫是因为她“在政治上被欺骗了”。再比如加州理工学院的安德鲁·费杰尔教授和他的妻子伊迪丝·费杰尔都信仰共产主义。钱学森不认同费杰尔夫妇的共产主义信仰,所以后来主动与他们断绝了联系。1946年钱学森不辞而别,前往麻省理工学院任职,费杰尔夫妇为此非常伤心。

这位女士关于钱学森政治倾向的上述证词未必全部可信,因为很显然,她不希望联邦调查局认定钱学森曾加入过美国共产党。鉴于这位女士向联邦调查局特工表示,她非常喜欢钱学森,

还不遗余力地替钱学森排除共产主义嫌疑,她和钱学森的关系应该非常亲密。为了保护特殊证人,联邦调查局的解密档案没有显示这位女士的姓名。

钱学森与威因鲍姆夫妇的友谊

当时有多条线索,使美国联邦调查局高度怀疑钱学森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他与西德尼·威因鲍姆的亲密关系。威因鲍姆是一个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科学家,1922年来到美国洛杉矶。他擅长演奏钢琴和下国际象棋。依靠教授音乐获得的收入,威因鲍姆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完大学。1933年,他博士毕业后留校担任化学家莱纳斯·鲍林的助教。20世纪30年代末,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使钱学森与威因鲍姆成为好友。

1938年,钱学森经同样爱好音乐的师兄马林纳介绍,加入了加州理工学院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讨论小组。这个讨论小组其实是由美国共产党组织的,用来教育党员和发展党员,正式名称是共产党第122专业小组。西德尼·威因鲍姆是这个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小组成员经常在晚上到一些已经成家的进步科学家家中聚会,讨论音乐和政治话题。在威因鲍姆家中举行的聚会一般包括学习和讨论两个主要环节。当小组其他成员讨论得热火朝天时,钱学森只在一旁安静地倾听。除非有人直接向钱学森提问,他不会发表任何意见。虽然钱学森经常参加这种会议,这本身就表明他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但是他在政治表态上非常谨慎。这种会议通常以音乐和茶点结束,此时威因鲍姆会弹钢琴助兴,而钱学森会负责吹中音竖笛。

二战期间,钱学森成为新成立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部门负责人。在前往麻省理工学院任职后,钱学森和威因鲍姆夫妇保持着通信联系。钱学森推荐威因鲍姆进入涉密的喷气推进

实验室工作,但是威因鲍姆向美国军方隐瞒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在1947年还推荐钱伟长重返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当时,喷气推进实验室有人向联邦调查局举报,说钱伟长是隐瞒身份的中共党员。这就加深了联邦调查局对钱学森的怀疑。

在1949年春准备重返加州理工学院时,钱学森委托威因鲍姆夫人,替他在洛杉矶请房产经纪人帮忙找房子。此时,威因鲍姆却遇到麻烦,有人举报他在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图书馆里,阅读大量与工作无关的涉密材料。当威因鲍姆接受联邦调查局特工约谈时,他承认是钱学森邀请他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因为钱学森是他多年的好友。不久,由于美国军方不同意让威因鲍姆继续接触涉密信息,他被喷气推进实验室解雇。

1950年6月6日,联邦调查局两名特工来到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他们怀疑钱学森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并且希望他指证威因鲍姆曾经是美共党员。钱学森否认自己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同时向联邦调查局特工表示,他相信威因鲍姆是忠于美国政府的,但是他无法确定威因鲍姆是不是美共党员。钱学森对此解释说: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衡量一个人是否忠诚的唯一标准是事实,但对于忠诚或政治信仰这种无形的东西,事实的标准又不能适用。

1950年6月16日,加州理工学院收到通知,美国军方已经禁止钱学森参与涉密项目。同日,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同年9月,他被判3项伪证罪成立,入狱4年,且不许保释。在此期间,钱学森也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8月23日,他被禁止出境。9月6日,钱学森在家中被捕。9月23日,他才被重金保释出狱。此后,钱学森被美国政府软禁长达五年之久。

据《档案春秋》荣正通/文

奏折里的“小报告”

奏折,从字面上讲,指折叠而进的臣子向皇帝报告事件的文书,也称折子、奏帖或折奏。它始用于康熙年间,雍正以后普遍采用,乾隆年间形成固定制度。至清亡废止,历时两百余年。

奏折奏事的资格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最初仅限于皇帝指定的少数亲信官员。雍正皇帝即位后,进一步扩大了使用奏折的范围。除了康熙时期有奏事权的地方的将军、督抚、提督和中央的大学士、尚书等人外,一些翰林、科道甚至地方上低微之员,亦允许上奏折。

奏折不拘格式,且不需要经通政司、内阁,直接由皇帝亲自拆阅,保密性强,因其折面、折内往往书有“密”等字样,故称为“密折”。

如果你以为奏折里书写的都是国家大事,那就错了。奏折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可分为请安、谢恩、缴批和陈事四类。前三类比较简单,陈事折则非常繁杂,涉及内政、军务、外交,上至国家政务,下至百姓琐事,是皇帝控制政权、了解和掌握内外官员动向的有效途径。

这样一看,奏折制度是不是很像“打小报告”?确实如此,康熙最初使用奏折的目的就是让臣子代为“打听”。康熙年间,秘密奏折得以推行,但还没有形成制度。到雍正年间,密折成为皇帝了解臣下人品、才能和工作业绩的主要渠道,从此制度化。雍正帝在统治帝国的13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紫禁城和圆明园中度过的,很少出京巡游,而如何做到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密折制度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臣下的密折,雍正提出了严格的保密要求:“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凡有密奏,密之一字,最为切要。”

和许多君王厌恶政务缠身不同,雍正十分享受批阅奏折这件事。雍正对密折的朱批,也不全是一本正经,反而有时嬉笑怒骂全无避忌。例如,他在朱批中告诫臣子要节省纸张,“一折一封”岂不浪费!,也有十分口语化的语言,如“该!该!该!不要饶了他们”,甚至直言“朕大笑惊讶览之”。

据《保密工作》布谷/文

